



“颂类”

文学精神
及其文体特征

段立超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结项成果（项目编号：07CZW013）

上古“颂类”文学精神及其文体特征

段立超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古“颂类”文学精神及其文体特征 / 段立超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601 - 8775 - 4

I. ①上… II. ①段… III. ①古典诗歌 - 诗歌研究 - 中国 - 上古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6079 号

书 名: 上古“颂类”文学精神及其文体特征

作 者: 段立超 著

责任编辑: 邵宇彤 特约编辑: 陶国立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 375 字数: 250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8775 - 4 定价: 39. 00 元

封面设计: 林雪

长春市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

2012 年 10 月 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前 言

今天的世界文化，各文明间的接触已经就发生在身边。但人们所持的各种观念与价值、判断和标准却时常大不相同。远距离相互接触，这种差异似乎还并不明显，而如果一旦交往深入，这种差异就越来越从所有的观念和细节中表现出来，并妨碍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与生活、接触与交流。不仅如此，即使在每种标准内部，由于多元化的存在，也导致了各种文明本身再也没有独自发展时所具有的天然的“合法性”，来保证自身被人们直接接纳，并奉为信条和准则。

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种多元交往的情况下，究竟什么可以作为最后的、在接触中各方都会认可的、并以此为根据可以达成共识、可以据之沟通的最终依据和价值判断？中国儒家的孔夫子，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安拉，阿尔卑斯山的宙斯……他们都已不再拥有如昔日的在某一文明内部的绝对权威，谁也不再是最后的仲裁者。借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这是一场众神的战争。”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遗落、信仰消失、人生虚无的时代。

那么今日，相互分裂是否根本无法统合。所有的一切，我们当如何来面对？即使先将上文这种全球性的视野暂时放置一边，作为独立的个体的人，每个有精神领域的生活需求并对自己的信念坚持诚实与认真的人，也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我们最终的判断依据究竟何在？什么或者如何才是真正的真理？什么才是更恰切的准则可使人依之在尘世间行走？

本书在中国古“颂”方面的探索，就是要部分地面对这个问题，并尝试给出解答。这一研究的思路在于，将通常“放之四海”的目光收回来，由向外转成向内，通过反观自视来对自己加以检讨、审视、理解，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中华民族在最高价值和终极判断方面是什么样的？又是怎么表达的？这种不更多强调偶像化的“神”、而更多地强调“神性”（如天道、道、德、先祖等）的独特方式，其好处何在？其文化产生的基本模式是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对人类在这个方面认识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些特征是否可以代表人性的某些本质？在其他文化、文明中是否还有暗合的情况？这种独特的方式是否具有可以在各文明中被接受的“普世”的可能性？若是能够回答这些问

题，那么，这种研究将有可能为解决各文明间的不一致提供一种华夏民族的看法或特殊的解决思路。

而使用这一方式的前提是，视人类的历史为一条有生命的、不断进行着文化演进的河流，这条河流可以通过检讨式的反向努力，而回溯到特定的文明起源，借助对源泉上游所堆积的错误观念、方向进行清理，我们有可能能够达到“正本清源”；同时，借助这种反思古人的独特检讨方式，也许可以为今天的思考和应对问题来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本书认为，“颂”不是普通的文学样式，它在古人的文化生活中极为重要，尤其在文明的初期阶段。“颂”的真诚与谦逊、赞美与追求，在各个民族的表达中虽然外在样态不同，但蕴含的精神却概莫能外。中原文明中作为宗庙盛会“告于神明”的“颂”，是华夏祖先通往最高精神向度的桥梁和表达，所以刘勰才在《文心雕龙·颂赞》中说：“四始之至，颂居其极。”这种独特的文类与生命本身的自我定位及最高判断直接相关。由于其显示“价值依据”的性质，“颂”的精神与功用、态度和语言延伸并体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实上，“颂”本身就是人之“本然”的一个侧面的表露。通过对古“颂”的定性、定位、形式、内容、特点、功用、演进等的研究，可以对含糊不明的认识加以审视、厘清，来发掘出“颂”真正的精神意蕴，帮助今天的生存实现超越式的回归，重新呈露人的这种本然：崇高与骄傲、庄重与尊严。

另外，在席卷全球的所谓“多元文化”的进程中，中华民族对自己的传统越来越生疏，这种状况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生命没有根基，精神陷入困惑与虚无。本书希望通过这种工作，将华夏民族古老文明初期、也就是文明生成的“轴心时代”的充满生机的某种“源头活水”引入当下，来浇灌今日的生活与心灵。并借助这种努力，了解前人对终极的体认、理解与表达，接近、反省他们的方式，尝试通过借鉴他们的生命方式，为今天面临的文化冲突与信仰漂泊寻找出路。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很多内容因为属于阶段性的思考和研究结果，尚在不断探索、思考、修订中，许多行文可以看作尝试性的讨论，并不一定代表作为最终判断的结论，借用海德格尔所说：我们不过是走在“思”的路上。事实上，本书希望对这个话题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一方面可以接受各位学人的不断批评、指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借此使这个话题不断地被再讨论、不断地被深入展开，那么，本书也就很幸运地尽到抛砖引玉的责任了。恳请对本书有兴趣的各位方家参与、鉴查。

序

篇题缀以颂字的作品，是古代一种重要的文类。它滥觞于先秦，兴盛于两汉，一直绵延到唐、宋以后。把颂类作品作为单独的门类而明确地加以标示，始于南朝。萧统编《文选》，第四十卷首列颂类作品，收录王褒、扬雄、史孝山、刘伶、陆机的颂类作品共五篇。刘勰《文心雕龙·颂赞》篇，分别论述颂、赞两类作品，提到从先秦到魏晋许多这方面的文人和作品。初唐许敬宗编《文馆词林》达千卷之多，其书多数卷帙亡佚，今存日藏弘仁本保存的篇幅最多，其中卷三四六至卷三四八收录的均是颂类作品，计16首，其中三篇只有存目，时间覆盖面从先秦到南北朝的刘宋、后魏。宋代李昉所编《太平御览·文部四》专列颂类条目，收录从两汉到南北朝有关颂类作品创作的历史记载及评论。宋人吕祖谦所编《宋文鉴》亦专设颂类栏目，收录北宋文人所作颂八篇。清人李兆洛所编《骈体文钞》收录西汉至隋代颂类作品13篇，亦专设颂类栏目。清人王先谦所编《骈文类纂》，在颂类栏目收录颂类作品21篇，作者涵盖从西晋到唐末的多位作家。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出，颂在古代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文类，得到各个朝代文人和学者的关注。只是进入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之后，这种文类被边缘化，受到冷处理。直到二十世纪末期，颂类作品才重新得到关注。段立超把早期颂类作品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所作的抉择，反映出那个历史时段学术发展的新动向。

颂作为文类名称，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之。《诗经》的《三颂》就是把颂作为单独的文类，从而与风和雅区别开来。最早对颂加以界定的是《毛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从颂类作品的功能着眼，对它加以解说。后代对于颂类作品所下的定义，基本是沿袭《毛诗序》的说法。《文心雕龙·颂赞》称：“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容告神明谓之颂。”刘勰也是以容释颂，而所谓的容，指盛德之形容。郑玄《周颂谱》称：“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孔颖达《周颂谱》正义则说得更加明确：“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状也。”照此说法，所谓的颂，指天子盛德之容，是天下大治、事业成功的容状。对于颂所作的这种解释，在古代基本已成定论。段

立超博士的这部著作，从颂字的构形进行考察，以《说文》的相关条目为依据，最后得出结论，颂字构形所表示的是人的动作形态：屈膝低头而口中念念有词之象，这正是向神灵祈祷的状态。这也是以容释颂，不过书中所说的容，并不是天子盛德之容、事业成功之容，而是向神灵祈祷者本身的形态。书中又援引《周礼·大卜》的“其颂皆千有二百”之语，指出颂是指人神交接文辞的专用术语，是由描述向神灵祈祷者动作形态的词语而演变成文类名称。这种把文字训诂与文献梳理相结合的运作方式，无疑是可取的。对于颂字所作的名实之辨，体现出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功底。这部著作对于颂类作品始终以文类称之，而没有称为颂体。段立超博士之所以采取这种表述方式，是因为她看到了颂类作品的多种文体样式。《诗经·三颂》以四言为主，其中又有杂言。到了汉代，颂类作品的样式呈现多样化的格局，刘向、扬雄的颂类作品是四言诗的样式，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则是散体议论，至于班固、崔骃、马融等人的颂体作品，则与辞赋没有什么差异。这部著作对于颂类作品多元化的文体样式作了客观描述，并对文体演变的原因加以探讨，从而使得许多章节具有较大的深度。不满于现象的描述，而是要进一步探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是段立超博士多年来的学术追求，这种勇于探索、勤于思考的精神在书中不时可见，确实难能可贵。颂类作品最初用于人神交接，到了后来，它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不再是只用于人神交接，而是用于许多场合，功能日益多样化。这部著作充分注意到颂类作品功能由单一向多元的演变趋势，并且对其中的关键环节作了重点论述。《楚辞·橘颂》的咏物，董仲舒《山川颂》的面向自然，刘向、扬雄颂类作品的以赞美人物为中心，在书中均有清晰的论述。即使同是以人物为赞美对象的颂类作品，所选取的人物在角色上又有明显的差异。对于蔡邕颂类作品所作的分析，就明确指出所赞美的人物社会角色与先前同类作品的差异。由面向神灵到面向自然、再到面向社会的人，汉代颂类作品功能演变的轨迹清晰可见。早期的颂类作品主要用于赞美，到了东汉马融的《广成颂》，作品的创作主旨却是用于讽谏。对此，这部著作所作的剖析亦颇为精到。对于作品的阐释兼顾它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效应，是这部著作又一重要特色。

这部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早期颂类作品，所涉时段从先秦到汉末，而以汉代为重点。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期，如何看待经学与颂类作品的关联，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这部著作从文本解读入手，从不同侧面揭示出汉代经学与颂类作品之间的互渗互动。董仲舒《山川颂》所体现的经学理念、颂类作品文本形态与四言诗被经典化所产生的效应、颂类作品创作者的经师角色等，在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联，是近些年的热门话题。但是，人们往往从经学大背景去观照汉代文学，而缺乏对具体作品的深入解

读，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难以继续深入。这部著作一方面对汉代经学作宏观审视，同时更注重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发现颂类作品与文学的关联，提出一系列富有启示性的见解，所采用的方法是可取的，避免了空疏浮泛的高谈阔论。

段立超的本科、硕士、博士生涯均是在东北师大度过的。早在本科期间，就已经是基地班的佼佼者。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东北师大古代文学专业最年轻的教师。立超是我在东北师大招收的最后一名博士生，她聪明颖慧，悟性颇强，并且在理论思辨方面有着良好的训练。照理说来，她的博士生期间应该进展顺利，多有创获。可是，由于本人工作调动，指导不利，从而延缓了研究工作的进程。从当初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到现在，已经十年有余。从论文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算起，距今也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在此漫长的时段中，段立超博士备尝艰辛，也经受了多方面的历练。在确定这个选题的世纪之初，从事颂类作品的研究者寥寥无几，如今却是已有一系列相关成果问世，呈现出喜人的景象。我相信，段立超博士随着人生的成熟，学术上也会走向成熟。希望她以这部著作的推出为起点，不断地超越自己，创造学术的辉煌。

李炳海

2012年6月23日 于北京寓所

中文摘要

本书所要研究的“颂”，是立足于一切华夏文明可见的文化成果：形诸典籍、金石者；口耳传承者；条畅于一家或诸家学派者；归属于一个大的显性文化传统者。同时，本书也力图不局限于这些文本的记录本身，而尝试转换视点、拓展视野，以“人”为本位、起始点和归宿，从“人”、人本身的生活、人创造的文明开始，对所有问题重新作出探讨和现象还原式的研究、考察。

为此，本书所作的“颂”的研究，包括颂之“文体”，可是并不局限于此，而是要把“颂”作为一种“文类”来认识。全书将以上古华夏文明的演进为基本依据，在尊重已生成的“颂”类文学、文化的全部历史内容的基础上，尝试综合反映“颂”在生成期的样态与流衍。以期还原“颂”在文学史中应有的“大文类”的本来面目；并通过结合具体作品的详细论证，尝试对“颂”类文本蕴含的独特文学和“文类”特征、其在华夏文明中占有的独一无二的精神地位等，作出新的理解、描述和说明。

全书共分为六个大部分：

第一章：颂类作品研究的方法论 本部分以综述的方式，按时间顺序介绍古往今来“颂”的创作、整理和研究情况，并通过述评探讨和思考“颂”的观念和研究、提出自己的理解和反省。在此基础上，重新确定“颂”作体例划分的观念和标准。本书打破单一“文体”的文本归类和认识方式，而尝试使用三级“体类”的划分标准，来认识历史上属于颂的作品。

在这种观念下，这些作品会形成一条河流，其主干是我们可以称为“颂体作品”的正宗之颂，而其支流则处于与其他文类相交叉融合的边缘部分，可以称为“颂属作品”，这些文本其体类特征呈现多元的态势。

因此，在上述的“文类”观念之下，各种有代表性的文本体类将可以比喻为相互有关的不同水系。各个水系各自有自己的主干，比如颂、赋、碑、铭、论、文、辞等文类是各不相同的主干水系，它们有自己各自的代表性作品，可以称为“赋体作品”、“碑体作品”、“铭体作品”……而同时，这些水系也有自己的支流，它们处于这些水系的非主干地位、文类特征不那么明

显,是从主干流衍出来的多元化文本,处于各个水系之间相互影响互动的地带,常常呈现出与其他文类相交叉融合的风貌,是各个主干体类的“属类”作品,可以分别称为“颂属”作品、“赋属”作品、“碑属”作品、“论属”作品等等。这些“属类”作品,站在不同的主流里审视,可以归入不同的体类。例如《橘颂》,从“颂”的角度看,可以称为颂类作品,而若从辞的角度看则也可以称为辞类作品。

基于此,本书研究“颂”所涉猎的范围将超出“五四”以来“纯文学”意义上的文体研究,而以“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大文化视野,追寻“颂”文化的历史生长进程,将先秦两汉历史文献中符合“颂”之字源意蕴也即人文精神意蕴的全部文本都纳入认识与讨论的范围。并使用“三级分类法”: (1) 颂类 (2) 颂体 (3) 颂属,用以勾连古今相互隔膜文体划分标准。

第二章:先秦颂类作品奠基论 首先讨论和梳理了颂字在先秦的常见用法和字义。接下来着重论述“颂”字作为单纯词,其在上古华夏文明史中的意涵;论述说明“颂”是会意字。本义为人屈膝低首用语言与神灵沟通。其指称范围扩大后,泛指沟通神灵的多种行为和一般的外表仪态。又因为同音假借,有了“容纳”的含义,基于此,东汉学者对“颂”字的解释与先秦相比有差异。“颂”字的基本内涵,是“人对其所认识的‘最高者’或‘终极’的衷心称美歌扬”。

本章的第二节辨析了“颂”在金、甲、简帛文献中的意义、“颂”与“诵”、“容”、“讼”、“讼”、“讼”、“讼”、“讼”等字的相互关系,在初期文献语境中呈现的使用状况、“颂”所使用的上古文化氛围等得出结论——“颂”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蕴含了人的神性追求和神性展现的特殊文化样式;它是人对神圣性的衷心称扬,在上古文化背景下,其指向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最高者:神明和祖先。

早期的、或者说生成期的“颂”具有“神性”的特质,其内涵与外延凸显了先民世界所具有的超越性本质。在这种新的界定和解释之下,颂的根本属性会得到更好的体现。“颂”作为语言符号的任务也可以明确起来:“颂”在汉语中代指一种高远的人文精神表达,这种表达涉及终极依据、终极价值和终极情怀。

在此基础上,本章还结合具体作品对先秦的“颂”进行了体性的界定、体貌风格描述和人文情怀特征审视,归纳出颂类作品的判断依据和创作标准。书稿对《诗经·三颂》、《管子·国颂》、《楚辞·橘颂》、卜颂、秦刻石的体类归属作出了探讨。并论述了先秦“颂”,常谐韵,语句整齐,气格“端昂清朴”、“信笃诚悦”的文学特征和这些文本作为滥觞期作品的奠基功能。

第三章:汉代“颂类”文学文献梳理 按照前两章设定的基本标准搜

集、划分和描述存世文献，综述作家、作品，叙述汉代颂类的文类辨析与发展概貌。并且说明：汉代颂类文学是具有政治属性的主流文学，代表了知识分子的理想和精神追求。汉代颂类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西汉、东汉前期和东汉后期三个阶段，分别代表继承、发展和定型的不同时期。考察汉代颂类文学的发展可以发现，汉代颂类文体的流衍现象极为突出，梳理这一现象可以帮助理解汉代文体的变化。今天的我们应以更为客观、同情的态度感受汉颂，体会其作为古人之政治情怀载体的重要意义。

第四章：融会贯通的经学奇葩《山川颂》 本章从董仲舒的《山川颂》作为“文颂”所具有的特殊品质入手，来研究和探讨。说明汉代前期“颂体”的经学化问题。提出董仲舒以引经据典、顺承模仿、融会创新等方式，重新诠释了儒家原有的山川理论观念。在内在的沟连和外在的创新中，《山川颂》既保留了儒学原有的精神内涵，又创生出新的表达方式，形成了对“先秦以来儒家山川传统”非常有效的经学化阐释和表达；同时伴随着这种创造，“山川颂体”的“体格”也从原来先秦的“祭祀诗颂”向汉代新的“解经文颂”转变，发展出独特的体式和风格样貌，标志着汉朝时期“颂体”作为文学体裁的新可能。

第五章：西蜀才子奏响的盛世之音 本章主要讨论司马相如、王褒以及扬雄的颂类作品。西汉武帝、宣帝两朝处于太平盛世，西汉颂类作品的创制，也进入旺盛的阶段。这个时期另外两位极具特色的颂类作品创作者是司马相如和王褒。此两位文人均出自蜀地，是才子型文人。他们生活在武帝和宣帝时期，创作的颂类作品是典型的盛世之音。同时，由于两人所处历史阶段的差异，以及各自的才性、经学理念的区别，他们的颂类作品也随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貌。

《封禅文》中的颂诗，处在整幅篇章的后部，又与前面的散体叙事部分相互呼应，是一种承袭了《庄子》但又别出心裁的结构形态。颂诗采用四言形式，表明对这种诗体赋予庄严、神圣的属性，把它视为向神明昭示成功的最佳诗体。其一方面继承汉代祭祀歌诗的传统，同时又有精心的调遣，体现在题材的选择上，是以瑞祥之物为主题。颂诗咏物的功能，在这几篇作品中以凝练的形态发挥出来，成为中国古代咏物诗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特色，显示出西汉盛世的气象。

到了西汉后期，国力逐渐显示不足，但是对强盛时期的记忆，却还保留在文人学士、皇朝卿臣的作品中，这些也仍然可以看做是盛世之音的一种回响。例如扬雄的《赵充国颂》，就是一篇以颂扬前代名将为题材的作品，可以简称为人物颂。对于《赵充国颂》的写作时段、缘起及叙事、用典情况进行深入考察，可以帮助全面展示那个历史阶段颂类作品的风貌、走势。扬雄的

《赵充国颂》是西汉颂类文学作品的殿军之一，西汉颂类作品的创制，到扬雄就基本告一段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扬雄的《赵充国颂》在西汉颂类作品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性质。

第六章：王朝、经学盛衰迭替中的颂 本部分探讨刘向、班固、崔骃、马融、蔡邕的颂类作品。刘向的《列女颂》在汉代颂类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节论述了《列女颂》具有总括传文的作用，同时兼具全书目录的性质。就文体而言，后世分类中的颂体和赞体在《列女颂》中有合流的趋势，显示了汉颂文体属性多元化的特质。

而班固的颂类作品，虽然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窦车骑北征颂》一篇，另外的《东巡颂》、《南巡颂》，已经残缺不全。但是，《窦车骑北征颂》是班固的一篇力作，在取材上与他的名作《封燕然山铭》相一致。《窦车骑北征颂》反映出东汉早期颂类作品的特征，同时，班固的随军出征的经历，使他成为早期的边塞文人，也使这篇作品带上了鲜明的边塞色彩。《窦车骑北征颂》在汉代颂类作品发展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同时在内容和理念上又有向《周颂》回归的倾向。是颂类文学中与赋体有交叉的颂作，也就是赋颂。

另外，近代发现的崔骃《四巡颂》也为研究汉代颂类文学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四巡颂》是东汉时期著名作家崔骃的代表作，也是汉代颂类文学的扛鼎之作。其创作充分体现了汉代士人对最高政治理想和儒家价值的歌颂，对于最高精神的礼赞，也彰显了汉颂瑰丽雄伟的艺术风貌。在汉颂发展的历程中，《四巡颂》是对以《橘颂》、《九歌》为代表的辞颂传统和以《时迈》为代表的诗颂传统的融合、继承和创新。

汉代马融的颂类作品，完整保存下来的有《东巡颂》和《广成颂》。除此之外，他的《梁大将军西第颂》残留不相连贯的数句，《上林颂》则是古人虽有提及而没有文字遗存的作品。马融所处的东汉中期，社会处于衰落阶段，经学也由盛入衰。由此而来，马融的颂类作品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尤其是他的《广成颂》，在体用两方面都与前代颂类作品有很大的差异，呈现出颂类体格上最为明显的“叛用”特征。马融作为经学大师和学者型文人，他的两篇作品明显带有以学问为文的特征，同时，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许多新进展。

到了汉末，社会巨变、文学转型，作为名流和天才，蔡邕都处在激流动荡的关键位置。他的“颂作”，创新与复古并在，群相与个性共生，体现出崩裂前夕：集体的失语与呼唤、个体的徘徊与追寻。就“颂类文体”而言，其创作：“赋”、“颂”分流，显示出“赋颂双关”、“颂意赋作”的“秦汉大颂”之衰落；“碑”、“颂”融合，创格为“碑颂联属”、“颂体悼作”的“末世小颂”之新风。

综合而言,通过全书六章的写作,“颂”类文本目前可见的:在先秦、两汉的创作情况、使用情况和体貌特征、精神品格;“颂”之作者与其文体形式、功能、创作指向、风格的演变之间的关系;“颂”之体类特征的“常”、“变”和创作指向的多样化;相应时代、文化背景、主题、理论的“颂”作观念;“赋、颂”、“碑、颂”、“传、颂”、“辞、颂”的相互关系等等,都大致可以得到体现和描述。

在新的“颂”作观念与体类的个案分析之下:(1)具有比较典型文体特征,并以颂命名的颂,如诗颂(《诗·颂》、扬雄《赵充国颂》等)、论颂(如《管子·国颂》、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等)、文颂(董仲舒《春秋繁露·山川颂》)、辞颂(屈原《橘颂》、崔骃《四巡颂》等)、碑颂(《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西狭颂》、《京兆尹樊陵颂碑》)之类。(2)符合根本精神意蕴,并表现出相应现实用途,但不一定以颂命名的颂,如楚辞(《九歌》)、秦刻石(泰山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等)、汉郊祀辞(《安世房中歌》、《西极天马歌》等)之类。(3)被“双重命名”,或不以颂命名,而实际是“颂”作的作品——如赋颂(《洞箫赋》等)、碑铭(班固《高祖泗水亭碑铭》);或不以颂命名,而其中包含“颂”作的组合型文本(指由两种或以上文体组合而成的文本)——如碑颂(蔡邕《光武济阳宫碑》等)、文颂(司马相如《封禅文》)之类。(4)以“颂”命名,但精神指向与现实用途不甚相合、有时甚至恰恰相反的颂,如刘向《列女传颂》一部分、马融《广成颂》等。也都将拥有自己在颂类文学中应有的位置、并可以得到文体的解释和说明。

而贯穿在所有的认识与考量之下的研究主旨,则在于论证先秦、两汉“颂”类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人文精神,及其对现今生活所具有的启示性价值与意义:

上古的“颂类”文学,是艺术起源时期的文艺样式。其核心的文字字形,可以追溯到古文明发源的造字阶段;其文献对口头创作的记载,始于神话古史时期;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则具有人类早期性灵状态所特有的宗教性、原型性和神圣性特质。在汉民族文化形态生成的早期,“颂”是华夏祖先沟通人神、省视自身的最高依据;在今天其表达的内容也总是与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相关;其散发的人文精神,是人自身之“神性”的敞开,也是中华文明最独特而根本的“向‘道’而生”。

关键词: 颂;文学精神;体类特征

目 录

中文摘要	(1)
第一章 颂类作品研究的方法论	(1)
第一节 上古“颂”之学术史述评	(1)
第二节 “颂”之研究的方法论	(12)
第三节 “颂”作的“体类”划分阐述	(18)
第二章 先秦颂类作品奠基论	(26)
第一节 “颂”字在先秦的常见用法和字义	(26)
第二节 “颂”字本义新考	(32)
第三节 论早期“颂”的神性特质	(37)
第四节 论“颂”类作品的判断标准	(52)
第五节 先秦“颂”的体类概貌	(58)
第三章 汉代“颂”类文学文献梳理	(65)
第一节 存世文献及作家作品综述	(65)
第二节 汉代“颂类”文学的划分	(67)
第三节 汉代颂文的体类辨析	(70)
第四节 汉代“颂类”文学的发展脉络	(75)
第五节 汉代“颂类”文学的认识与评价	(79)
第四章 融会贯通的经学奇颂	(83)
第一节 理解途径的思考	(83)
第二节 上古前期的山川理解方式	(84)
第三节 孔、孟、荀山川表述的差异与勾连	(88)
第四节 “文颂”创制中的“颂体”经学化	(93)

第五章 西蜀才子的盛世华章	(103)
第一节 司马相如《封禅文》中的颂诗	(103)
第二节 王褒的颂类作品	(112)
第三节 扬雄的《赵充国颂》	(122)
第六章 王朝、经学的盛衰之颂	(130)
第一节 刘向《列女传》颂辨	(130)
第二节 班固和《窆车骑北征颂》	(135)
第三节 崔骃《四巡颂》钩沉	(142)
第四节 马融对颂作的叛用	(156)
第五节 蔡邕颂作与汉末文学新创	(164)
参考文献	(176)
后记	(182)

第一章 颂类作品研究的方法论

第一节 上古“颂”之相关学术史述评

本书所说的“颂”，指的是在上古汉语中可以形成领域的一种文化现象，其选材和研究范围相对于纯文学的研究将有所扩大。在这种大文化的研究视野下，甲骨、金石、简帛、传世文献、考古结论、现代文化人类学及历史、哲学等的研究成果，都会被作为已有的背景加以考察和使用。

基于此，则“颂”有文献可查的最早字形出现在金文中。之后，先秦两汉的各种文献多有应用。其基本的词义是对“终极”的赞美与表达。“颂”最早作为作品的体类出现，可以追溯到原始部落时期，之后其创作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至今不绝的一个文化系列。

本书将对这个系列的前期形态进行追溯与考察，尝试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式，尽力对其蕴含的华夏人文精神信息作出阐释，并对其整个文类体系的发展脉络作出描述和整理。研究的规模，划定在“上古”（两汉及之前）的文化发生范围内。在进行这一工作之前，首先介绍并回顾若干与本研究相关的学术史内容。

对“颂”的文本创作认识述评

对于本书所涉及课题方向的研究，需要涉及的主要相关文献，大致有：古代及近现代的含有先秦两汉“颂”体文本的文献；古代及近现代涉及“颂”体文学研究及文体研究的主要著作及文章；研究颂体文学需要作为知识背景的历史学、经学、哲学等领域的部分著作。现归纳述评如下：

对于“颂”的研究，古往今来，有大量的作者和论著，但每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特色与关注的方向。总的来说，整个中国古代时期，对“颂”的认识与研究基本在《诗经》“三颂”为蓝本的儒家思想标准的框架内。进入近代，西学东渐，国内学者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历史与传统，“颂”的研

究进入前所未有的拓展期，出现了一个对原有认识的全面反叛，最典型的就是对“颂”的各种批评。之后，随着国人心态的逐渐成熟与对各种研究方法、方式的熟悉，现代学术的“颂”类文学研究越来越多样化，对这种文类的认识也在日益加深。

“颂”类文学在整体的历史发展流程中有两条大线索，一是文本创作，另一是对文本的理解和研究。前者在历史形态的呈现上，早于后者。最早的有文献可考的“颂”，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的传说时代。刘勰认为，传说中的“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这种说法见于《文心雕龙·颂赞》，更早的依据为《吕氏春秋·古乐》篇。其中所说的“颂”，现在已无具体的文献内容可考，但是根据远古历代歌乐互有损益的传承情况来推测，这些可歌可舞的“颂”，其文本内容应当是与《诗经·三颂》类似的“颂诗”。而有具体内容存留的“颂”，源于《庄子·天运》篇所说的炎黄时期：“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目前，这种说法在学界尚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在这个问题上暂时搁置讨论，而用前人成说。）

有些当代学者认为，《诗经》里有“风”、“雅”、“颂”之分，那么保守地说，至少在《诗经》编定时，“颂”已经是一种诗体的定名了。而如果结合现在学界已有的相关民俗学研究成果来推测最后一种说法：“到《诗经》结集时，‘颂’可以被认为作为一种文体名称成立，”这种判断稍显有些保守，是过于尊重文献的实证意义，而将历史上“颂”的实际发生、发展历程，人为地大大延后了。（关于“颂”之民俗学研究的部分论证，请参见韩高年博士在博士论文《颂诗的起源与流变——三代诗歌主流的逻辑推演与实证研究》中的研究成果。）依据逻辑推断，“颂”作为比较成型的一种文体的名称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更早的时期。（而更早文明阶段中，“颂”在文明发生期的语义内涵，请参看本论文第二章第一节《颂字本义新考》。）

另外，本文所用“上古”一词的含义，需要作些说明。“上古”是个有歧义的时间概念。本文沿用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划分方式，将曹操摄政前的时期划定为“上古”^①。

对“颂”的理论认识的述评

（一）文本的结集

关于“颂”的理论研究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部分来看：一是专门的文论，二是文本的结集。就结集而言，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卷12~14页。